

廣州文史資料

(選 輯)

第 二 十 期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广州文史资料

(选 辑)

第 二 十 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 9 8 0 年 9 月

K2508
19.19

广州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州日报印刷厂印刷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32开本 8.125印张

1980年9月 印数1—6,000

书号: 11111·66 定价: 0.82元



目 录

在周总理身边的回忆·····	范桂霞口述、范凯执笔	(1)
郭沫若同志在广东片断·····	罗雨林、韩于西	(19)
我参加革命的回忆 ·····	饶卫华	(40)
安铺中学的革命斗争·····	钟永月 (麦耕整理)	(101)
迎接广州解放的回忆 ·····	凌 璆	(113)
孙中山先生到松口二三事 ·····	丘一中	(118)
黄埔军校武汉分校 ·····	何崇校	(124)
广州中山纪念堂建筑史料 ·····	刘成基	(149)
广州市网球运动发展史 ·····	李次民	(154)
华工被卖猪仔的惨史·····	张诗教 (麦耕整理)	(168)
抗战胜利后美国电影在广州的泛滥·····	刘康口述 丘庆镛辑录	(171)
东山浸信会见闻片断 ·····	松	(197)
正果之战亲历记 ·····	黄韬远	(204)
正果之战片断 ·····	卜一鸣	(223)
从苏杭到百货——解放前广州的百货业 ·····	罗伯华 邓广彪	(228)

附录：大新百货公司拾零

在周总理身边的回忆

范桂霞（口述） 范凯（执笔）

我在总理身边的日子，虽然过去了半个世纪了，但总理的音容笑貌，依然历历在目，总理的亲切教导毕生难忘。每一念及总理，我就禁不住热泪满腮，百感交集，心如潮涌。回忆把我带回到霜天黑夜的二十年代去……。

一、腥风血雨突袭广州 英雄儿女云集香港

一九二七年，是中国黎明前的黑暗年代。共产党的活动给人们带来了一线曙光。探求救国真理的青年们，怀着崇高的献身精神，纷纷加入到伟大的革命行列来。我这个纺织女工出身的师范学生，在共产党的教育下，加入了广东新学生社、广州妇女解放协会和共青团。正当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开始不久，国民党蒋介石出卖革命，大批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同志。在上海“四·一二”大屠杀开始不久，接着广州又

开始了“四·一五”大屠杀，不知多少革命同志倒在血泊中。在这个白色恐怖的日子里，革命组织被破坏，出现可耻的叛徒，我也不能回校去了。

那时，我家住在广州观连街七号（即现在教育路）。那天半夜，我正在小阁楼里写信，闻得军警凶猛撞门的叫喊声。这叫喊声音很熟悉，就是叛徒侯交礼。我来不及通知在楼下的二妹，连忙把未写完的信装进衣袋，立即爬上瓦面去，躲进了邻屋的烟楼里。叛徒带着反动军警入屋，抓走了我的二妹范桂笈，她是个刚入团不久的新团员。他们遍搜全屋，还登上瓦面，厉声威胁，向空中开了几十枪。不管敌人怎样吓唬，我就是不理睬，不出来。等到敌人全部走光以后，约半夜后三点多钟了，我从烟楼里爬出来，回家洗面洗手，换衣服。到楼下时，才知到二妹已经被捕。我的父亲，是一名正直爱国的医生，也被反动军警用枪头打昏倒在地上，奄奄一息，吐得地上一大滩鲜血。敌人因抓不到我，就迫我父亲交出女儿。父亲说，“桂霞在学校确没有回家，我无法交给你们，你们去找她吧”。这样激怒了敌人，所以把狠恶手段施加在我父亲身上。当时我的弟妹和母亲已把父亲扶到床上躺着，此后就不治而死。在他去世前，还喘息着一再叮嘱我：“霞女，你快逃走吧！反动军警一定会再来捉你的。……”我连父亲的丧事都来不及办理，便悲痛万分地告别了母亲，趁着黑夜，就匆匆忙忙离开了家庭。

到那里去呢？广州到处戒严、军警林立。我趁着黑夜，

到河南宝岗一间小屋里，找到了一位相识的纺织女工，她是我的同乡，姓朱的。我知道她非常忠厚，就躲在她的家里，由她帮我去打听码头上有没有军警搜查捉人。过了几天，她帮我买好了去澳门的船票。我坐船到了澳门，住在一个世伯的女儿家里。因为找不到党组织，心里闷得发慌，决定到香港去寻找党组织。

香港是个繁华热闹的大都市。但没有熟人，就没有立足之地。在茫茫人海中，到那里去寻找党的组织呢？到了香港，我在大街上怅惘地踱跼了半天，一个熟人也没有碰着。后来想起有个同村的兄弟叫范桂东，住在香港长洲岛。于是，我就先到范桂东家，找个住宿的地方，然后每天仍然出香港，在街头上流浪，希望遇着熟人，找到组织。有一天碰见一位原市立师范姓李的学生，我认识他是我三妹的同学，知道又是团员同志。我向他打听有没有我的同学在香港？他叫我到莉园新街莉园书店去碰一碰。我高兴地跑到莉园书店去。到书店，果然碰到了同学何志坚。他是这间书店的责任人。我知道他也是个共青团员。于是我商得他同意，就从长洲搬到书店楼上住。我在这书店住了几夜，见到冯宝铭后，又遇到朱英娥。她也是广州相识的团员同志。英娥知道了我的遭遇，非常同情，把我带到她家里去住。她的父亲是个商人，住宅比较宽敞。她看见我随身只带了两套粗布学生装，便把她的旧衣服给了我穿。后来，她要到上海升学去，就把她从头到脚的穿着送给我。

我在朱英娥家住着很安稳，但因为未找到党组织，精神上仍很苦恼。我问朱英娥知不知道龙锦雯在那里？她说：曾经见过。我请她设法告诉龙锦雯，我正在到处找她。过了几天，龙锦雯亲自到朱家来，我一见到龙锦雯，立即高兴地奔向前去抓住她的双手不放，把她拉到房中，把我的遭遇，从头至尾告诉了她。龙锦雯热情地听完我的汇报以后，叫我耐心等待，待她向组织请示，一定会安排我的工作的。几天以后，龙锦雯又亲自来找我，把我带到她家里去。她家住在香港石矿咀的一条横街小巷里。原来她家就是广东省委秘书处的办公地点。她的丈夫沈宝同就是当时省委的秘书长。沈宝同把我留在秘书处工作。以后我每天都在那里负责抄写文件与交通联络工作。我经常要送文件去西营盘的一个交通点。这个交通点的联络人是区梦觉和谭夏声（即谭天度）。有时候，我还要把文件送到九龙、红坎等联络点去。当时党的同志陆续秘密云集到香港来。一些党的重要领导人来港时，多数是单身，没有携带家眷。香港当时租房子都要有家属才行，叫做“非眷莫问”。所以单身汉就连房子也租不到，且容易暴露身份。秘书处就要派出人去照料和掩护。有时候，我也被派到接待站去工作。接待的地点，不是固定的，经常要变换，没有接待任务的时候，我就回到秘书处去抄写文件。我曾经在凤凰台、西营盘、西环、湾仔等地方，接待过李立三、恽代英、阮啸仙、彭湃、瞿秋白、董必武、黄平、林伯渠等领导同志；还有李沛群、沈青、曾国钧、庞子谦

等很多同志。接待李立三和恽代英、董老等，是由我一个人单独接待的。其他同志是两三个人或四五人在一起同时接待的。当时我只有二十二岁，是个未结婚的姑娘，相当拘谨，单独去接待男同志，总是不习惯；日子久了，有些厌倦这工作。我回到省委秘书处向沈宝同诉苦，表示再不愿去做接待工作了。沈宝同笑着和他的妻子龙锦雯商量。沈宝同说：

“桂霞的工作做得不错，这个接待工作很重要呀，做不好会给党带来很大的损失”。龙锦雯说：“桂霞是个老实古板的姑娘，现在有个特殊任务，最好派她去接待“老周”。于是沈宝同把接待“老周”这个重要任务交给了我。我听到“老周”的接待任务非常重要，也不知道“老周”究竟是谁，就只好点头答应了。

二、病床旁边日夜守护 亲切教导情如长兄

第二天，吃过中午饭，秘书处赖谷良同志把我带到油麻地广东道一座他预先租下的房子去。这所房子很宽大，有一厅两房，另一间工人房。房子的陈设布置也很好。大厅里放着酸枝木雕花台椅。安排我住的房间里，有两铺床，一张五桶梳装柜台，还有两张藤椅。我看完房里的摆设，心里明白这次一定是接待重要的首长，心里不免有点紧张。我细心地把各种陈设弄好，吩咐请来的一位负责厨房工作的老工人，准备烧茶煮饭，好象是这个家的主妇一样。布置停当以后，

我就一边看书报，一边焦急地在客厅等待着。

大概下午五时以后，接近黄昏的时候，门外响起了小汽车的喇叭声。我急忙打开门，看见东江特委杨石魂同志，从车上背下来一个重病人。这个病人身材高大，身穿长袍马褂，头戴绒毡帽，脚穿学士鞋，还戴着一副黑眼镜。我急忙上前，把他们迎进房里。我把病人小心地扶到卧房的床上躺下，帮他脱掉鞋袜，除去黑眼镜，盖上被子。只看见这个病人面色焦黄，形容消瘦，正在发高烧，昏迷不醒。我刚拧开了电灯，就进来了一位医生。医生检查完毕，吩咐必须每一个小时给病人探热一次，要用个小本子登记好。我到这里之前，省委秘书已分配我担任护士的工作，也说明了在这里各人的身份。老周是“大少爷”，上海富商，我是“大少爷”，杨石魂是“二少爷”。各人伪装的身份，必须恰如其份。医生吩咐探体温、喂药的工作，自然由我来担当。“二少爷”就要跟着医生出外取药去。在他们去取药的时候，我端了藤椅坐在床边，出神地望着病人。看他那浓黑的剑眉，瘦削而英俊的脸庞，使我想起来了。“啊”！我差一点喊出声来。原来是大家敬仰的周恩来同志。在广州广东区委机关里我曾经听过他的讲话，到黄埔军校参观时也见过他，他那刚毅的声音，温和的眼睛，热情的笑容，潇洒的风度，在我脑子里留下过深刻的印象。他是两广区委的军委书记，又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和当时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党代表，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敌人最害怕他，群众最爱戴他。我在这

里当特别护士，可要小心当好。我充分意识到自己责任的重大，工作更加谨慎。我每一小时给他探一次体温，等杨石魂拿了药回来，我就小心地一口一口喂他吃。我几天来不分日夜地守护在床边；眼睛熬红了，也不敢上床睡觉，生怕他的病情变化。看他热度慢慢下降，出了汗水，我小心地帮他抹干净，换上干衣服。因为这是自己崇敬的党的领导人，我觉得能够为他恢复健康做一点工作，就是自己的最大幸福。这个时候，连一向常有的羞涩之情也全部忘记了；我只记得自己的责任和光荣。我用尽全部热情，细心体贴地看护这个病人，不致有负党的期望。

三天三夜以后，周恩来同志慢慢清醒了。当他第一次睁开眼睛的时候，我高兴得掉出眼泪来。我激动得立刻站起来。他睁开眼的第一句就问我是谁？这里是什么地方？我告诉他，我叫范桂霞，是省委沈秘书叫我来这里当特别护士的，这里是香港油麻地。我还说杨石魂同志也在这里。这时，杨石魂闻声也从隔壁房间跑过来，高兴地扑上来，叫：“大哥，你醒过来了！”他热情地紧紧握住周恩来同志的手，一会儿又转过身来，拉住我欢乐得要跳起舞来。周恩来同志清澈明亮的眼睛，现出了喜悦的光采。他微笑着轻声问了我们一些情况，叫我们坐在他的床边。当他知道他自己曾经几天几夜发高烧昏迷不醒的时候，他关心地看了看我们疲劳的神色，要我们马上去休息。我们早已兴奋得忘记了疲劳、一点也不想睡觉。我甚至还情不自禁地唱起歌来，又怕影响病人

的休息，只好轻轻地哼着走出房外，去张罗给周恩来同志炖鸡汤吃。炖好了鸡汤，我亲自端到床前，准备喂他吃。周恩来同志挣扎着要起来自己吃，我和杨石魂都把他按住，不让他起来。他说什么也不肯再让我一口一口喂他，最后只好把他扶起来，斜靠着床头，慢慢来喝。可是当他看到碗里的鸡肉时，他那粗黑的浓眉就皱起来。我看他的脸色不对，心里一怔，以为是炖得不好吃；谁料他是批评我不应该给他炖鸡吃。他语重心长地说：“反动派的大屠杀，给我党造成了惨重的损失，经济这么困难，你们却给我炖鸡吃。我怎么能吃下去！？……”我镇定地回答说：“你是个重病号，党决定要你补充营养，尽快地恢复健康，我是党委派来的特别护士，在这里，你得听从我的安排。”他只可无可奈何地说：“好吧！这次服从你，以后不能再炖鸡了，要注意节约每一个铜板才好。”我们看着周恩来同志把这碗鸡汤喝完了，才放心去打水来给他洗脸，直至扶他躺下，盖好被子，然后才满心喜悦地去安寝。这天晚上，我睡得特别香甜。

次早清晨，我醒得特别早，睁眼看见对面床的周恩来同志已经醒来了，急忙下地去叫工人打水来洗脸。周恩来同志叫我扶他下地走一走。我看见他的身体仍然十分虚弱，面色是那么苍白，不敢扶他下地；只好把杨石魂同志请进来。他坚持要下地走走看，我和杨石魂同志两人一起，一人站一边，搀扶着他下床，摇摇恍恍地走了一圈，然后扶他坐到藤椅上。从他那坚忍刚毅的表情，使我们相信，他一定有力量

战胜病魔。果然一周以后，他就能自己下床走路了。

大病刚愈那几天，党组织暂时不准他出外工作。每天我去给他带文件和报纸回来。他除了看文件和阅读报纸以外，经常一有空就叫我端把藤椅坐在床边与他谈话。他亲切地向我问长问短。他问我知道不知道邓颖超同志在那里？我说：“在上海，人人都这样说。”他问我确不确实。我知道他和邓大姐分开工作已经很长时间，心里一定非常想念邓大姐，就安慰地说：“这是真的，秘书处也这样说的，你不用担心。”他问我认不认识邓大姐，我说早在广州妇女解放协会工作时已认识她，他接着问我参加组织的情况，以及在广州的遭遇。我坦率地把什么都告诉了他。他对父亲的遇害，二妹的被捕，表示十分同情。他说：“革命是有牺牲的，我们要坚强地活下来，和敌人斗争到底！”他象兄长一样和蔼地教导我怎样生活，怎样斗争，怎样对付敌人。他还问我有了爱人没有？我本来有了一个男朋友，还未结婚，但很羞于启齿，因为看到周恩来同志是那么使人感到亲切，又那么使人尊敬，我愿意把自己的全部秘密都向他倾吐。我告诉他我已经有了一个要好的男朋友，名叫潘耀芳，是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学生，已加入了共产党，他参加东征打陈炯明，在广州打商团，又参加北伐军。回来时省委派他到广宁县去训练农民军了；是和周其鉴、李一伦、车振轮、周彩娱等同志在一起。自“四·一五”至现在，已失去了联系，不知道他怎样了。他看见我神色忧虑，就安慰我说：“广宁这支队伍已

经北上了，我清楚他们的情况，你可以放心。”接着他又以兄长的口吻温和地安慰我说：“他是我们的同志，很好。你不用担心，如果他是爱你的，他以后一定会回来找你，如果他不来找你，你也就不必再爱他了。”周恩来同志分析得很对。原来潘耀芳北上时，组织上派他到十六军范石生部，当国民党党部的特派员，改名潘公明，驻在韶关。当南昌起义失败以后，朱德同志退上山，改名为王楷（朱德同志别字朱玉楷，王楷是从玉楷节写得名）。党指示潘公明利用特派员的身份和朱德同志联系。原来王楷就编为十六军某团团长。等到发齐军需粮饷弹药枪枝以后，蒋介石发现王楷就是朱德同志，要范石生即刻将王楷逮捕。范石生是在云南朱德同志任旅长时的旧部，不愿逮捕朱德同志，把蒋的命令告诉朱德同志，要他自己离开。朱德同志向党请示，党指示他配合响应广州起义。潘公明协助朱德同志在仁化县起义，以后朱德同志带领队伍上井冈山。一九二八年元月，潘公明回来广东找省委，在广州找不到，又到香港去，终于找到了广东省委，以后也和我相会了。在潘耀芳回来以前，我总是发愁，有时候还偷偷流眼泪。周恩来同志帮助我开拓眼界，放宽胸怀。他不仅教我怎样处理爱情，还教我怎样处理对外、对内的工作。他询问我平常学些什么？有什么爱好？还告诉我：为了应付千变万化的复杂的情况，躲过敌人的眼睛，可不要太学生气。他说既然你现在伪装的身份是富商的“少奶奶”、就要学会抽烟和喝酒，以应付万一。但学这些资产阶级的生

活方式，一定要提高警惕，目的性要明确，不能使自己上瘾。有空的时候，他还拿了麻雀牌和象棋来教我。他叫我学会这些，以便敌人来搜查时，能镇静自如地伪装。平常应勤俭节约。我从他那里，学会了很多在学校学不到的学问。特别是在复杂的地下斗争中应懂得的各种斗争手段。在他的教导下，我从一个幼稚的女学生，慢慢变成了懂事的成熟的革命战士了。他非常关心我的进步，和我谈了“八一”南昌起义的情况以及武装起义的伟大意义。他介绍了起义军在潮汕失利的经过，还谈了他在战斗中患上了恶性疟疾，由叶挺和聂荣臻同志，用船把他护送到香港的情况。他给我分析了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的战略战术。特别是现在在香港工作这段时期，应如何注意掌握不同的情况和变化着的环境，进行灵活机动的地下活动，使我放开了眼界，坚定了革命的信心。我毕生难忘他的一切教导。

三、宁可带病徒步登山 不肯坐车多花一文

大约十多天以后，中共广东省委在香港召开研究广州公社起义的会议。这时周恩来同志的健康虽然仍未恢复，但他决定要亲自参加。因为他已经能够走路了。这几天不在卧房里吃饭了。吃饭是三个人在大厅里一起来吃。我和杨石魂同志把好的东西让给周恩来同志吃，周恩来同志总是不肯独自吃，一定要三个人一起吃。我知道周恩来同志要去参加会

议，希望他身体尽快复原。再次给他炖了鸡汤。他一边批评我不应再花钱为他炖鸡汤，一边把鸡汤分成三份，硬说我们日夜护理他太辛苦了，应该增加增加营养，非要我们一起把鸡吃掉不可。我们没办法办说服他，只好陪着他一起把鸡汤喝了。从这以后，我再也不敢给他炖鸡吃了。为了给他补养身体，改变为炖些牛肉汁给他吃。因为他要出外开会，地点在坚道，距离住地较远，路也不好走。我和杨石魂同志商量要给他雇一辆汽车，但周恩来同志坚决不同意。最后决定还是由我陪着他走路去开会。因为要出门了，我必须找一些好一点的衣服打扮一下，周恩来同志还是穿绸子的长袍马褂，一身富商的打扮。我就在朱英娥同学送给我的旧衣物中，挑选质量最好的旗袍或者穿上裙子，虽然是旧的，倒也很合身；脚上再穿上一双高跟鞋、打扮得很整齐。我护送周恩来同志一起出门，坐电船过海，再沿着斜坡上坚道。上斜坡时，周恩来同志的身体虚弱，脚步飘浮，几乎支持不住。他的头上冒出了黄豆般大的汗珠，口里还喘着粗气；但他坚定地一步一步往前走。确实走不动时，他就扶着我的肩膀，稍歇一会再走。我看他走得太辛苦，劝他坐车子，他怎么也不同意。我没有办法、只好扶着他继续步行登高，终于胜利地到达会场。就这样、一连十多天，我都陪着周恩来同志到坚道开会。每次到达会场时，他进去开会，我坐在休息室里等候。在休息室里，遇到了沈宝同的爱人龙锦雯同志和澎湃同志的爱人许玉庆同志等多位女同志。大家都高兴地谈论着对

当前形势的看法。龙锦雯同志笑着说：“广州快要搞武装暴动了，我们又可以回广州去了，你们高兴吗？”我激动得跳起来，搂着龙锦雯同志急切地问：“真的吗？那太好了。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广州去？”龙锦雯同志微笑地摇了摇头说：“具体时间还未定，负责同志正在开会研究。反正是快了”。我听了心里说不出的喜悦。革命又要转向高潮了，我们又可以放开手脚公开工作了，多么高兴呀！这一天，我陪周恩来同志回“家”的时候，发觉他比上午来的时候更有精神，眼睛里充满着必胜的光芒。我高兴得忘乎所以。一进了“家门”，就迫不及待地向周恩来同志打听情况。他没有正面地回答我，也没有生气，只是和霭地笑了一笑，反过来问我说：“小姑娘，想家了吧？快了、不久的将来，你就能回广州会见你的妈妈了”。我还是不满足，仍然絮絮不休地缠着他问这问那，他还是耐心地开导我：“要沉着，等待时机，不能冒冒失失。准备工作做好了、才能发动起义，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周恩来同志这种坚定的信心，亲切的教导、热情的关怀、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使我终生难忘。

四、珍重握别、重战风浪、预祝胜利、嘱语在心

在周恩来同志养病的期间，是我的一生中受到最好的教育的时间。我一直把周恩来同志当作自己最亲密的兄长，最博学的老师，最忠诚的同志。我觉得在他身边的日子过得很有